

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5)综述

□毛基业 苏 芳

摘要:理论贡献是任何学术论文的首要因素,对于案例研究来讲尤其如此。本文在3个论坛主题报告的基础上,从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理论贡献的维度、以及如何突出理论贡献等3个方面讨论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之后再简要综述本届案例论坛的论文情况。

关键词:案例论坛 理论贡献 理论

坚实的理论贡献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首要标准(Pratt, 2008)。然而,近年来在组织和参与“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以下简称案例论坛)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国内案例研究水平的提升主要表现在数据分析的严谨性和论文整体规范性的改进,但理论贡献含糊不清仍然是个普遍而且主要的问题。鉴于案例研究通常是基于有趣现象的归纳逻辑,容易陷入就事论事,导致理论贡献缺失。因此,我们强调的“没有理论,就一无所有”这个讲法并不过分,未来国内案例研究的主要挑战也是如何提高理论贡献水平。

2015年的案例论坛如期在中山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130余所院校的40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年度盛会,论坛的规模空前、气氛热烈。台湾大学的许玮元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李平教授、复旦大学的卫田博士等应邀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和工作坊报告。本文第一作者也报告了从评审历届案例论坛论文中得到的观察和建议,以及个人多年案例研究的感悟。这些报告,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如何打造令人信服的案例研究,也涉及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和理论贡献。

以下我们结合本届论坛主题报告的内容和相关案例研究方法文献,分别探讨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理论贡献的维度、以及如何在论文中突出理论贡献这3个问题,之后再简要综述论坛的论文情况。

一、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

“没有数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数据是盲目的”(Sarker et al., 2013)。但究竟理论在案例研究中起什么作用,初学者不太容易理解。案例研究中理论贡献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很多学者不理解理论的作用,甚至何谓理论。在往届论坛的综述中,我们讨论过理论的作用以及什么是理论贡献(毛基业、李高勇, 2014),也曾以三篇发表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MJ)的经典案例研究为例,总结了**预设理论在提出研究问题、选择样本案例、分析数据和研究贡献等4个方面的作用**(李晓燕、毛基业, 2010)。

案例研究论文可使用多个起不同作用的理论(Sarker et al., 2013),既可预先使用理论指导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等,也可以在数据分析中引入新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数据。许玮元在她的主题报告(2015)中具体讲解了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以下两类作用:

(1)作为进入现场前的指导理论。这是文献驱动的研究,即在文献中发现某个重要的研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3201070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15YGL04)的资助。

究缺口,而这个缺口非常适合用案例研究来解答。此时研究者再根据预设的理论框架设计研究问题、收集和分析数据。许玮元以自己的一篇论文为例(Backhouse et al., 2006),在文献中发现信息系统安全的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忽略了人的作用这一研究缺口,由此引入权力视角等理论框架,并将研究问题设定为:权力如何影响国际标准的产生和制度化?而在收集数据时,也重点访谈权力方面的问题。而好的研究问题起着塑造文章结构、指导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的作用(Gephart, 2004; Sarker et al., 2013),需要体现研究缺口(Corley, 2012)并且包含潜在的理论贡献(Gephart, 2004)。

(2)作为数据收集后的解释(参照)理论。在数据收集之后,寻找有助于解释数据的相关理论,以此为依据提出分析框架;之后一般需要进一步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迭代。没有理论,数据就是杂乱无章的、没有意义的信息堆积(Sarker et al., 2013)。因此数据分析需要理论指导。完全不受理论影响的案例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Eisenhardt, 1989),因为即便是使用扎根理论,研究者也会受自身知识体系的影响。

研究者如何选择理论?许玮元(2015)建议选择自己有感悟的理论,这样更便于开展研究;虽然理论的选择存在主观性,但一定要在文章中解释该选择是合理的。研究者平时应该注意积累多个理论,以便能更加敏锐的解读现象、更快速的选择合适的理论。经常阅读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 期刊的文献,是积累理论的好方法。

二、理论贡献的维度

理论贡献是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必要条件(Pratt, 2008)。Colquitt 和 Zapata-Phelan (2011)提出从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这两个维度定量评估实证研究的理论贡献。其中的理论检验维度更适合定量研究,因为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构建理论(Welch et al., 2011),但理论构建维度基本适用于案例研究。理论构建的贡献从高到低的5个级别分别是:引入新构念(或显著的重新构建了现有构念)、对先前尚未探寻过的关系或过程的研究、在现有关系或过程中引入新的中介(作用机制)或者调节变量(情境因素)、考察早期理论构建过程主体的

影响、以及对以往解释过的效应进行的重复研究(Colquitt & Zapata-Phelan, 2011)。

除了对预设理论的贡献,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的另一个维度是对已有文献的贡献。AMJ 历届主编强调,需要讨论针对当前管理和组织领域的文献的贡献(Colquitt & Zapata-Phelan, 2011)。对已有文献的理论贡献与研究动机相呼应,体现在填补了文献中的研究缺口;或者化解了文献中的矛盾(如 Haveman, 1992);或者解释了某个特殊的现象,拓展了理论边界(Backhouse et al., 2006)。前两者是文献驱动的研究,而后者则是现象驱动的研究(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

卫田(2015)总结了案例研究的3类潜在理论贡献:第一,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机制来构建理论,化解文献中存在悖论或者填补文献中的缺口(如 Smith, 2014);第二,通过深化认识(Siggelkow, 2007)来拓展理论,填补理论上的缺口(Compagni et al., 2015),或者解释原有文献不能解释的现象;第三,通过提供全新视角(Graebner, 2009)来描述或解释现象来构建新理论,得到新的洞见(Siggelkow, 2007)。相比之下,第三类的贡献最大。

三、如何突出理论贡献

理论贡献是主编、评审、以及作者最为关注的内容(Pratt, 2008)。理论贡献的呈现需要通过与文献(和预设理论)的对话(Pratt et al., 2006),来体现研究结论(涌现理论)与文献相比有哪些新的发现和洞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贡献必须从文献中来又要回到文献中去。否则就会出现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模糊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两次对话和两个连接,来分别凸显对预设理论和文献这两个维度的贡献。

(一)两次对话,分别涉及研究问题与预设理论的关系和涌现理论与文献的对比

(1)研究问题与预设理论的对话出现在文献回顾章节,不仅要展示已有文献有了哪些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还有哪些重要内容没有提及(Pratt, 2008),而这些缺口正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Gephart, 2004)。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说明预设理论对研究问题的适用性;第二,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理论框架以及为涌现的理论提

供起点(Gephart, 2004)。例如, Smith(2014)采用悖论理论(paradox theory)解释管理者面临多重选择的管理困境。在文献回顾章节, 作者指出了企业管理中面临的战略悖论——探索和利用, 并指出战略悖论具备悖论理论的3个特点。随后作者回顾已有探索和利用文献如何管理战略困境, 同时指出研究缺口。在文献回顾部分, 并不是将预设理论和研究问题割裂开来, 分别单独进行回顾, 而是交互交织在一起。

(2)涌现理论与文献的对话出现在讨论章节, 通过比较涌现理论(研究结论)和文献, 突出理论贡献。我们建议将涌现理论与预设理论和文献分别比较。首先, 与预设理论的对话聚焦于与涌现理论之间的区别, 可以参考 Colquitt 和 Zapata-Phelan (2011)提出的理论构建的程度。例如, Smith (2014)发现进退两难困境和悖论之间的新关系(第二级贡献), 扩展了悖论理论。其次, 与文献的对话聚焦在研究问题和研究缺口, 即研究结论是如何填补研究缺口或化解冲突, 是清晰的阐述了过程, 还是构建了新的机制等等。例如 Smith(2014)指出动态战略决策过程(涌现理论)描述了如何区分和整合领导者实践来维持战略悖论, 回答了研究问题, 深化了对组织悖论的理解。除了与文献进行对话以外, 还可以将涌现理论与其他研究领域进行对话(Eisenhardt, 1989), 扩大理论贡献的范围。例如, Smith(2014)还提及了探索和利用战略悖论对二元性理论的贡献。

(二)两个连接, 分别连接研究问题、预设理论和数据这三者

(1)研究问题与预设理论的连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 根据研究问题重新解读预设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例如将权力框架的主要构念(理论)在信息系统安全的标准制定(研究问题)中进行重新解读(Backhouse et al., 2006); 第二, 运用预设理论来解读研究现象, 例如 Plowman 等人(2007)运用复杂理论(预设理论)来解释持续的小变化如何引发剧烈变革的问题。

(2)数据和理论的连接。理论与数据之间缺乏连接而造成的鸿沟, 是国内质性研究常出现的问题(毛基业、李高勇, 2014)。这个鸿沟表现在数据分析时就事论事, 没有使用具有普适意义的构念。而

对于归纳出来一些拓扑图, 图中的概念和关系在正文中没有定义和展示证据, 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因于研究者在数据分析时忽略了理论的作用。因此, 衡量有无理论贡献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使用概念描述与解释现象, 因为概念是理论的基本要素, 而概念一般来自已有理论。否则, 要么是就事论事, 要么就是重新发明轮子(从头开始构造已有理论)。为避免出现理论和数据之间的鸿沟, 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 在研究方法章节清晰阐述数据分析的过程。恰当且清晰的描述研究方法对所有案例研究都至关重要(Pratt, 2008)。Pratt 指出研究方法章节除了指出选择案例研究的理由、抽样和研究情境外, 还需要展示数据分析方法以及连接数据和理论的方法。Pratt 建议呈现数据分析步骤、并运用图表辅助分析等(Pratt, 2009)。许玮元(2015)和卫田(2015)都建议研究者借鉴目标期刊近3年的案例研究, 分析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章节, 总结归纳共同点, 有选择性的呈现数据分析步骤和方法。

第二, 在数据展示部分需要处理好数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Pratt, 2008)。有几种做法可以连接理论和数据: 首先, 根据理论构念解读由数据中涌现出来的发现, 例如许玮元等报告了在信息系统安全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 有哪些事件体现了外部影响(预设理论的重要概念)(Backhouse et al., 2006: 435)。其次, 运用数据填充预设的理论框架(Pratt, 2008), 这与卫田(2015)建议的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展示研究发现类似, 即提一点理论, 展示一些数据(原始数据和描述数据), 再提一点理论。最后, 兼顾展示数据(showing data)和解释数据(telling data)也是连接理论和数据的一个很好方法, 解释数据指报告研究发现, 而展示数据是引用原始的数据。这些做法都有助于读者将原始数据与分析数据联系起来, 进一步将分析数据和涌现的理论联系起来(Corley, 2012)。

数据与理论的关系处理不当会产生两类问题: 要么没有与理论对话、要么与理论联系过于紧密(Pratt, 2008)。虽然前一类问题更为常见, 后一种也常有发生, 它变现为数据分析被已有理论所束缚, 案例数据被降低为说明或演示理论的例子, 导致没有超出已有理论的涌现性新见解, 因而没有理

论贡献。此外,有的论文的数据分析是基于预设概念框架对研究现象相关的数据条目分类或者计算条目,过度依赖编码。为避免以上两种情况,应该坚持案例研究的归纳逻辑,让有趣的发现从数据中涌现。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与已有理论不一致的想象,进而实现对已有理论的深化、情境化、修正、延伸、甚至颠覆。

四、其他建议

本届论坛的主题报告也涉及一些其他相关问题,我们简要介绍如下:

几个主题报告都提到了在研究开展之前首先要明确哲学基础,因为哲学基础是读者与研究者相互理解的桥梁。不同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案例研究,在研究问题、样本选择标准、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Sarker et al., 2013; Siggelkow, 2007)。目前管理领域运用最多的两类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Sarker et al., 2013)。实证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可以被认识的真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个真理。所以实证主义的研究重视信度和效度。而解释主义强调情境和变化,研究目的在于理解社会行动者在真实情境中所用的概念(concepts)和意涵(meanings)是如何产生的,无需考虑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无需做信度和效度的保证,而实证主义案例研究也仅有部分文献提及了信度和效度(Sarker et al., 2013)。例如,如果数据分析依赖词条编码和计算,就应该检验并报告编码者间的一致性(interrater reliability)。尽管许玮元的报告(2015)主要介绍理论在解释主义案例研究中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与实证主义案例研究中的理论作用一致。

在写作技巧方面,由于案例研究是一个数据与理论反复比较的迭代过程,合理的写作顺序能够提高写作效果和效率。卫田(2015)建议研究者先写讨论,明确理论贡献,随后根据理论贡献来组织文献回顾、数据展示(研究发现)、研究方法等各章节,最后写引言。

毫无疑问,引言是最难写、又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引言的目的在于引起审稿人和读者的兴趣,这也是审稿人评估论文是否重要的关键。因此,引言

要体现两点:第一,强调这个研究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展示研究缺口,还要说明为什么填补这个缺口很重要(Pratt, 2009);第二,研究者要简练的展示足够丰富的信息,让评审或者读者认识到研究者对该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卫田(2015)建议四段式引言:第一段介绍研究领域。开篇可以是介绍一个极端的现象或者事件,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引起评审和读者的兴趣;如果找不到极端案例,也可以从文献开篇;第二段介绍这个领域里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哪些视角没有考虑到;这些研究缺口需要与讨论部分的理论贡献相对应;第三段介绍本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四段简要介绍研究贡献。

五、论坛概况

本届案例论坛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管理理论构建”为主题,共收到来自海内外107个单位的194篇参会稿件,最终收录论文集105篇(请见表1)。来稿论文主要关注传统企业的互联网、互联网+、创业创新等主题。论坛程序委会按照严格的“双向匿名评审”程序,经过三轮双向匿名投票,评选出最佳论文10篇(其中教学型3篇,研究型7篇)、最佳审稿人3位。

我们注意到,案例研究似乎比大样本定量研究有更强的时效性、更接地气。在选题和内容方面,除了历来较多关注的创业和创新、战略等以企业为分析单元的研究以外,今年有不少研究都是针对互联网+、传统企业向互联网+的转型等前沿热点问题,更多反映了现象驱动的导向。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注意到以下可喜进步:多案例研究明显增加(基于跨案例分析和复制逻辑的命题更坚实)、理论指导更加明确(更加关注预设理论和数据分析的理论视角)、预设理论的针对性和与现象的契合度、理论构念在数据分析中的体现、数据分析的严谨性的提升(关键构念的测量、以及证据显示),以及研究问题与案例方法的匹配度提升了。

案例研究的主要不足除了本文讨论的理论贡献和数据分析方面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常见的缺陷

表1 来稿和录用情况

论文类型	来稿数量	录用数量	录用比例
研究型案例	163	85	52.1%
教学型案例	31	20	64.5%
总计	194	105	54.1%

表2 单案例、多案例与质性研究的对比

	典型研究问题	最适用(但不限于)研究对象	研究设计	数据分析	案例要求	难度(非机构性)
单案例	How/Why	发现并解释演化过程、机制	单个实验	故事性强	极端性和高启发性	最高
多案例	How/Why	关系发现(命题)、过程模型构建	多个独立实验/复制逻辑	故事性弱、跨案例复制一对比、构念测量	遵循理论抽样原则(代表性)	高
质性(较大样本)	What	归纳构念内涵、关系(假说)检验	与大样本调查接近	无故事、大量编码、构念测量与关系确立	无	中

是研究设计,表现在单案例、多案例以及质性研究的混淆与错配。有部分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多案例研究,但既没有被 Yin(2009)称为可视作一组独立实验的案例,也没有跨案例的比较分析,其实只是使用访谈数据的调研(survey)。有些多案例研究缺乏基于研究问题和多个独立实验的复制逻辑的理论抽样,案例选取不够恰当。我们用表2来简要对比说明这三者的主要区别。

最后,我们认为在对案例研究方法有一定了解后,精读范文对提升研究水平比较有帮助。这里我们特别推荐徐淑英和蔡洪滨主编的《美国管理学会学报》最佳论文集粹(第二辑),包含该刊2005~2009年的六篇最佳论文,其中有三篇多案例加一篇单案例研究。这四篇都是精品,从研究质量、问题的有趣性、理论贡献和论文写作等各方面都是典范,有助于提高案例研究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责任编辑:尚增健)

参考文献

- (1)毛基业、李晓燕:《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2009)综述与范文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 (2)毛基业、李高勇:《案例研究的“术”与“道”的反思——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3)综述》,《管理世界》,2014年第2期。
- (3)许玮元:《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Role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Data Analysis》,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5)主题报告,2015年。
- (4)卫田:《案例研究的论文写作和理论构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5)工作坊报告,2015年。
- (5)Colquitt, J. A. 和 Zapata-Phelan, C. P.:《管理研究中理论构建与理论检验水平的变化趋势:基于《美国管理学会学报》50年历程的分析》,《管理世界》,2011年第6期。
- (6)Backhouse, J., C. Hsu & Silva, L., 2006, “Circuits of Power in Creation De Jure Standards: Shaping a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Standard”, *MIS Quarterly*, 30, pp.413~438.
- (7)Compagni, A., Mele, V. & Ravasi, D., 2015, “How Early Implementations Influence Later Adoptions of Innovation: Social Positioning and Skill Reproduction in the Diffusion of Robotic Surge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1), pp.242~278.
- (8)Corley, K., 2012, “Publishing in AMJ—Part 7: What’s Different ab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3), pp.509~513.

(9) Eisenhardt, K.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 pp.532~550.

(10) Eisenhardt, K. M. & Graebner, M. E.,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pp.25~32.

(11) Gephart, R. P., 2004, “From the Editor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4), pp.454~462.

(12) Graebner, M. E., 2009, “Caveat Venditor: Trust Asymmetries in Acquisi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3), pp.435~472.

(13) Haveman, H. A., 1992,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Performance under Conditions of Fundamental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pp.48~75.

(14) Plowman, D. A., Baker, L. T., Beck, T. E., Kulkarni, M., Solansky, S. T. & Travis, D. V., 2007, “Radical Change Accidentally: The Emergence and Amplification of Small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3), pp.515~543.

(15) Pratt, M. G., 2008, “Fitting Oval Pegs Into Round Holes: Tensions in Evaluating and Publish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op-Tier North American Journal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1(3), pp. 481~509.

(16) Pratt, M. G., 2009, “For the Lack of a Boilerplate: Tips on Writing up (and Review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5), pp. 856~862.

(17) Pratt, M. G., Rockmann, K. W. & Kaufmann, J. B., 2006, “Construc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Role of Work and Identity Learning Cycles in the Customization of Identity among Medical Resid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2), pp.235~262.

(18) Sarker, S., Xiao, X. & Beaulieu, T., 2013, “Guest Editorial: Qualitative Studi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 Critical Review and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MIS Quarterly*, 37 (4), pp. iii~xviii.

(19) Smith, W. K., 2014, “Dynamic Decision Making: A Model of Senior Leaders Managing Strategic Paradox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6), pp.1592~1623.

(20) Siggelkow, N., 2007, “Persuasion with Case Stud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pp.20~24.

(21) Welch, C., Piekkari, R., Plakoyiannaki, E., & Paavilainen-Mäntymäki, E., 2011, “Theorising from Case Studies: Towards a Pluralist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2(5), pp.740~762.

(22) 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Vol.5, Sage.